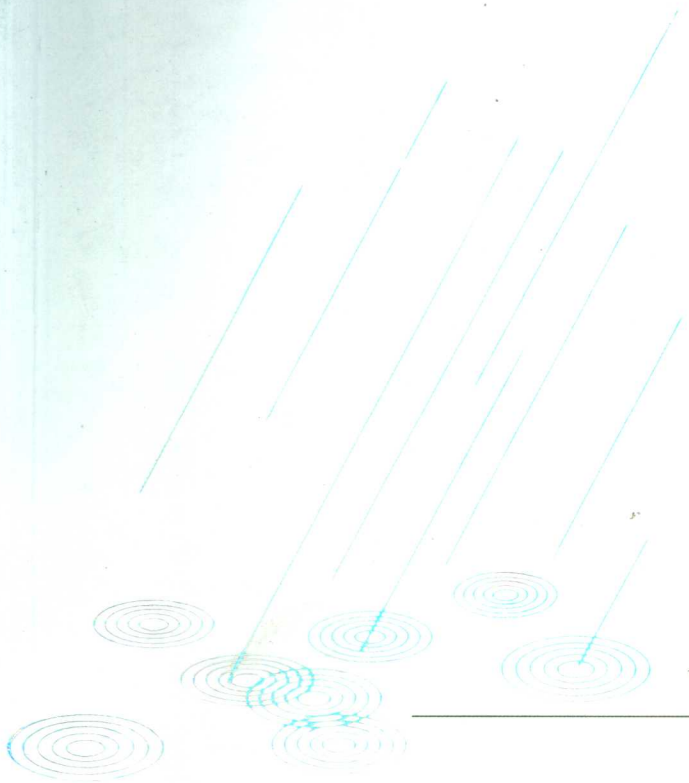




雨巷中走出的诗人

——戴望舒传论

□ 王文彬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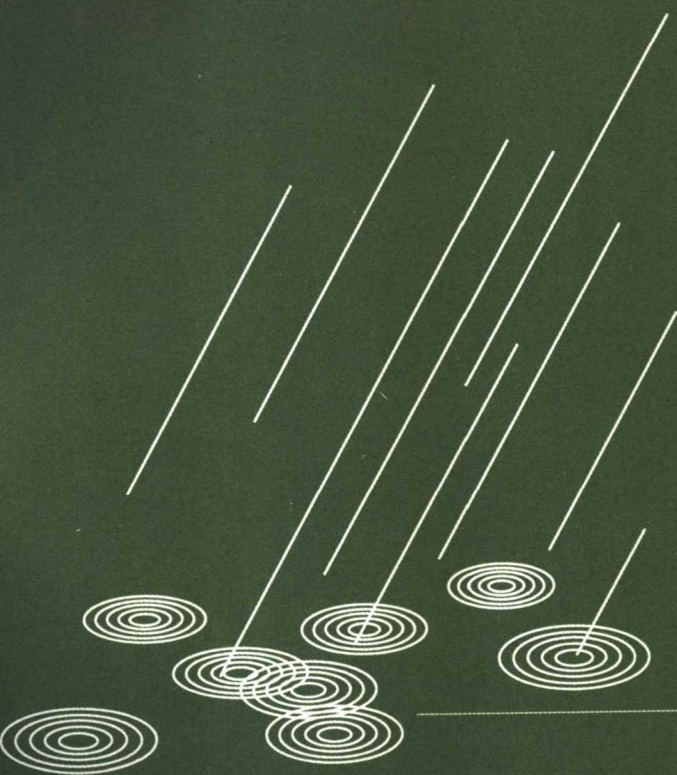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

雨巷中走出的诗人

——戴望舒传论

王文彬 著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商务印书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雨巷中走出的诗人:戴望舒传论/王文彬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ISBN 7-100-04377-8

I. 雨... II. 王... III. 戴望舒(1905~1950)—
生平事迹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666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Yǔxiàng Zhōng zǒuchū de shīrén

雨巷中走出的诗人

——戴望舒传论

王文彬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4377-8/K·837

2006年6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0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4 1/4

定价: 38.00 元

雨巷

中走出的诗人
——戴望舒传论



第1章 童年和学生时期(1905~1927)	(1)
1. 家世和童年	(2)
2. 宗文四年	(11)
3. 就读上海大学	(25)
——政治、艺术多元理念的萌蘖	
4. 求学震旦	(39)
第2章 诗国天空的新星(1927~1932)	(49)
1. “文学工场”	(50)
2. 步入文坛	(68)
——“同路人”的文学	
3. 诗集《我底记忆》	(85)
——由选择而制作合脚的鞋子	
4. 殉情与订婚	(98)
5. 诗集《望舒草》之一	(110)
——忧郁的剖析	
6. 诗集《望舒草》之二	(121)
——诗“应去了音乐成分”	

第3章 旅法及其归来(1932~1938)	(137)
1. 游学法国	(138)
——政治上左翼,文艺上自由主义	
2. 共结连理	(164)
3. 创办《现代诗风》和《新诗》	(179)
——对“纯诗”的阐释和试验	
4. 译介《从苏联回来》的前前后后	(200)
——与纪德的思想艺术因缘	
第4章 在血火中的香港(1938~1945)	(221)
1. 南中国海上的《星座》	(222)
——个人世界融入到抗日的公众世界	
2. 自殒和离异	(245)
3. 我等待着 长夜漫漫	(260)
第5章 那里,永恒的中国(1945~1950)	(287)
1. 沪上风云	(288)
2. 诗集《灾难的岁月》	(319)
——只为灾难树里程碑	
3. 北京的春天	(333)
——由爱国而向革命的诉求	
结 语	(351)
主要参考征引书目	(356)
戴望舒年表	(361)
后 记	(382)

第 1 章

童年和学生时期 (1905~1927)



他的缺陷引导他去接受加倍精心的训练。

——阿·阿德勒：《生活的科学》

1 家世和童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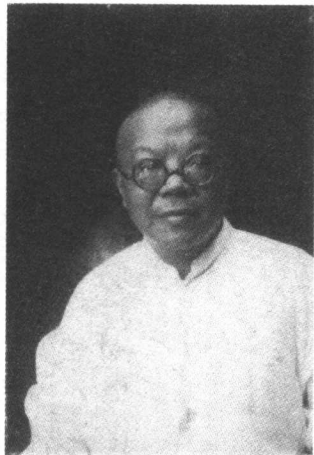
星去星来，宇宙运行，
春秋代序，人死人生，
太阳无量数，太空无限大，
我们只是倏忽渺小的夏虫井蛙。

（《赠克木》）

这是戴望舒 41 岁时给他的朋友金克木的一首诗中的一节，抒写他对宇宙和人生的感悟。生命源远流长，对于人类个体虽说是宝贵的，但却是倏忽渺小、偶然短暂的。就在这无数的绵延不断的偶然和短暂中，1905 年 10 月 5 日（农历 9 月 7 日），戴望舒——本书的传主——在杭州一户平民百姓家中诞生了。

（1）

戴望舒原名朝霖（按家谱排下来的），字丞，小名海山。父亲名立诚（1881～1936），字修甫。戴望舒出生的时候，戴修甫还在京奉铁路北戴河火车站服务室任职（担任译电员）。杭州家中还有母亲卓佩芝（1883～1976）和长望舒三岁的姐姐戴瑛（1902～1952），名麓玫，小名阿宝。



父亲戴修甫

（20 世纪 30 年代于杭州）

戴家祖籍南京祖洪成谷村，以纺织丝绸为业。戴修甫的父亲因与别人合伙开织丝工场，遂迁居杭州。父亲死后，家业由长子经营。戴修甫排行居二，随姑母到天津读书，完成中学学业后到北戴河火车站供职。辛亥革命后，辞职南归，在杭州财政局任职员，后调入杭州中国银行任行



员,直至1936年6月病逝。戴修甫性格开朗,喜欢莳花养鸟,所种剑兰、春兰都是佳品,所养的画眉、百灵,婉转善鸣。爱好书法,中学时曾得过奖。笔者曾看到他的一本乙亥年(1935年)日记的残页,直行行书,笔法圆润,流畅雅致。日记记录两天的事情,一是3月30日中国银行在上海召开股东大会,二是记襟兄之弟钟怒庵生平事迹,日记说怒庵为“钟氏族中最和平之一者,平时寡言而与人接物颇亲善,文笔在北方及东三省各处负盛名。”记叙了他们的亲情:近年南下归里,“余隔日必往一叙。说到病事,非常顾虑,余每劝其遇事总以乐观方面着想,有病以静养为宜。”可见其是一位重感情重友谊的性情中人。戴修甫宽厚、热心,亲家、女婿生大病,请医服药,他都亲自过问,除女婿是时疫伤寒未能治好,其他人都在他悉心护理下痊愈。他是中国银行老员工,人头活络,常给亲友介绍安排工作。中年开始发胖。他有一张照片,身披玄色袈裟,袒胸露腹,手捏佛珠,表明自己像乐善好施、笑口常开的弥勒佛,显现他的风趣和人生向往。戴修甫办事能力很强,但一直到病逝,仍然是一个职员。有人说,主要是因为他吃鸦片,难以晋升。据他的外孙女说:“我看到,平时他不吸鸦片,只有客人来了,才摆出烟盒,主要是应酬,有时客人是上海的行长。”^①小职员也有自己难以言明的苦衷。戴修甫有哮喘病,女儿戴瑛和戴望舒都有遗传,戴望舒后来即死于此病。

母亲卓佩芝,祖籍浙江塘棲。祖父做过官,有“卓半城”之称。父亲靠祖父产业当公子,有子女八人,卓佩芝排行第四。卓佩芝七岁时,母亲去世,父亲放纵无度,家道中落。续弦后,将八个子女丢置一



母亲卓佩芝

(20世纪60年代在上海中山公园)

^① 钟英(戴瑛之女):《我的回忆》(手稿)。

旁,冬天,雪下得很厚,子女们只有单薄的棉袄;堆了半房的萝卜,则是他们一冬的菜蔬。有时女孩子连梳辫子的头绳也没钱买,只能靠帮人家折锡箔元宝,得一点零用钱。折一千只,只有几个铜钱。大姐与卓佩芝关系较好,也最疼她。14岁时,父亲和继母要迁居浙东,她不愿意跟着去,哭着求大姐。大姐到父亲面前求情留下,同时把她安排在尼庵暂住。两年后(1901年),由媒婆介绍,嫁给戴修甫。卓佩芝有一点“羊白眼”,自幼伤母,缺少温暖,性格较倔强。父亲不管子女,所以她幼年未读书,大姐自幼读书,能成本地讲述《西游记》、《水浒传》等一些古典说部,卓佩芝在姐姐的熏陶下,也能成本讲述“西游”、“水浒”等说部,一直到晚年,还讲给第五代子女听。童年的戴望舒从母亲讲述的娓娓动听的故事中,萌发了对文学最初的爱好。他后来回忆说:“在童稚的时候,它(《水浒传》)做过我的好伙伴,到现在两鬓垂斑的时候,它仍不失是我的枕边秘笈。”^①

戴修甫和卓佩芝结合时,他们的两个家庭都已经衰败。戴修甫在北戴河车站供职时,每月寄钱回家,供给家用。家境虽然贫寒,但是礼数很多,婆婆也较苛严。卓佩芝要穿“高低儿”(旗装,鞋底当中有木块),早晚都要向婆婆跪拜请安,怀孕了,还要承担大家庭繁重的家务。有一次戴瑛看到大伯家买了一担黄金瓜,她也吵着要,卓佩芝买了几个,戴瑛哭着要买很多,卓佩芝说我们怎么好和他们比。戴瑛仍是哭闹,卓佩芝就打她几下。婆婆知道后,抓住卓佩芝的头发,把她拖到祖宗堂前跪下,一面打,一面骂,甚至把头上的钗也打断了。直到戴望舒会走路后(3岁),戴修甫才把他们母子三人接到北戴河。在北戴河车站时,生活也很窘迫,卓佩芝给车站几个同仁包饭,稍作补贴家用。三年后,回到杭州,赁屋居住在大塔儿巷28号。^②此时,孩子们还小,开销不大。到戴瑛出嫁时,家中已负债了,卓佩芝后来回忆说:“月月寅吃卯粮。”^③戴修甫每月都买航空奖券,希望一朝中

① 《读〈水浒传〉之一得》(1943年4月10日),《戴望舒全集》(散文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381页。

② 据戴望舒《致曾朴》(1927年12月22日),《戴望舒全家》(散文卷),第69页。

③ 据钟英《我的回忆》(手稿)。



奖。有时戴修甫还画草图，说中了奖，要盖一幢房（带园子的平房），把草图上的房子按家中人口一一分配，但是，始终也没有中奖。

大塔巷以塔得名，据说这塔是清朝杭州城区中心的标志。28号一门住两户，还有一家姓蒋。从大门进去，有一方小庭院。庭院西边有一道门，通向蒋家。庭院正面是戴家门厅，有一道屏风。门厅较暗，右边停着一顶供出门用的轿子。门厅后面，右厢房是戴修甫夫妇的卧室，左厢房是戴望舒的卧室兼书房，里面有一张床，一张淡黄色的书桌和两大两小



姐姐戴瑛

(20世纪20年代在北平)

四个书柜。戴望舒后来在《断指》一诗中所说的泡着酒精的断指的小瓶，就放在书柜里。少年及中年，他的同学和朋友来了，就到这间房里谈话。外甥女钟萸至今还清楚记得，郁达夫晚上一来，就和舅舅谈天到深夜。两排厢房之间有后轩和天井院。左右厢房后面各有一间杂屋，两间杂屋之间又有一方小庭院。庭院朝西有门通向与蒋家公用的后园。戴修甫莳花养鸟都在这个园子里。园内有一口深井，即使大旱之年也有井水。夏天，每天上午用布袋放西瓜，沉到井底，下午吃“冰西瓜”。有时还用井水冰“石花”（似凉粉一类食品，加白糖、醋食用）。庭院和杂屋后面是厨房。戴家在这里居住了20余年，直到1936年戴修甫去世，戴望舒结婚，才举家迁徙上海。

戴望舒家的周围都是纵横交错的小巷：大塔儿巷和小塔儿巷从东向西蜿蜒，皮市巷和华光巷横贯南北。他由华光巷向南去上小学，又沿皮市巷北行到中学读书。由大塔儿巷向西，再穿过几条小巷就到了西子湖畔。课余，他和小朋友们常常在湖里钓鱼，摸螺蛳。小巷、西湖，如画的山光水色，给戴望舒留下毕生难忘的印象，也成为他构筑的艺术世界的重要内容。后来，他以《雨巷》一诗鸣世，并被戴上“雨巷诗人”的桂冠。戴望舒的同乡、作家冯亦代在《雨巷》问世50多

年以后,还十分感喟地说:“我心里永远保持着《雨巷》中的诗句给我的遐想。当年在家乡时,每逢雨天,在深巷里行着,雨水滴在撑着的伞上,滴答滴答,我便想起了《雨巷》里的韵节。”^①他在诗文中,曾多次抒发对故乡的思念和赞美。20世纪40年代,他只身滞留沦陷区香港,刻骨的乡思升华为一腔爱国深情。在《我用残损的手掌》一诗中,他写道:

我用残损的手掌,
摸索这广大的土地;
这一角已变成灰烬,
那一角只见血和泥;
这一片湖该是我的家乡,
(春天,堤上繁花如锦障,
嫩柳枝折断有奇异的芬芳,)
我触到荇藻和水的微凉;

.....

在这首怀念祖国的抒情诗里,小小的西湖竟占了四行。中间两句又特别加了括号,说明并非写现在敌人占领下的杭州,而是写想象中的西湖。诗人超越了诗的规定情景,喷涌出对故乡深深的怀念之情。家乡对于诗人来说具有永久的魅力,那里有温暖,有梦幻。有时,甚至在不经意的雨后檐溜的叮叮的响声中,他也仿佛觉得是“给梦拍着柔和的拍子,好像在江南一只乌篷船中一样”:

“春水碧如天,画船听雨眠”,韦庄的词句又浮到脑中来了,奇迹也将突然发生了吧,也许我已被魔法移到苕溪或是西湖的小船中了吧.....^②

① 冯亦代:《戴望舒在香港》,《龙套集》,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0页。

② 《山居杂缀·雨》(1945年7月),《戴望舒全集》(散文卷),第56—57页。



他就这样常常陷入怀乡的凝思悬想之中。

钱塘自古繁华。山石林泉的柔美明丽,烟云雾霭的空濛奇幻,必然对生于斯长于斯的生命个体的精神世界给予丰润的滋养和提供多种可能发展的机缘。戴望舒以自己的生存方式叩问故乡山水的人文意蕴,并逐渐与之对象化。积之于心,沉潜涵蕴,久则化之,形成了秀美婉约的美学情趣:对具有半透明质感的细腻的青郁的艺术色调的爱好,“给梦拍着柔和的拍子”的生命节奏的敏感体验。可以说,杭州是戴望舒生活和艺术的起点,他在这里度过了平淡而略带苦涩的童年和青少年。

(2)

给戴望舒的童年生活蒙上一层阴影的,是他三岁那年曾害过一场天花,病愈后即在脸上留下瘢痕。这给他带来无法解脱的苦恼。当他涉足社会以后,生理上的缺陷,就被当作为取笑和奚落的把柄,在那个人们互相倾轧的病态社会中,他常常因此被挤到生活中弱者的地位。这一不公平、近乎残酷的创伤经验,像年轮一样,随着岁月不断扩展,嗣后,即使他已成为一个名重文坛的诗人,也还不时受到甚至是朋辈中人的讥嗤。张天翼是望舒宗文中学时的同学,1931年12月在《北斗》(1卷4期)上发表一篇题为《猪肠子的悲哀》的小说。小说带有自传色彩,写“我”(老张)与绰号叫猪肠子的中学同学在车站邂逅的情形。猪肠子问道:“你现在怎样?你好么?……你以后看到麻子没有——你看过他的诗么?……”隐隐约约中以望舒的缺陷作为小说的素材。这是同辈人的微讽。纪弦(路易士)是比望舒晚一辈的诗人,在纪念望舒逝世40周年的文章中写道:“记得有一次,在新雅粤菜馆,我们吃了满桌子的东西。结账时,望舒说:‘今天我没带钱。谁个子最高的谁付账,好不好?’这当然是指我。朋友们都盯着我瞧。我便说:‘不对。谁脸上有装饰趣味的谁请客。’大家没学过画,都听不懂,就问什么叫做‘装饰趣味’。杜衡抢着说:‘不就是麻子吗?’于是引起哄堂大笑,连邻座不相识的茶客也忍不住笑起来了。”^①

^① 纪弦:《戴望舒二三事》,《香港文学》1990年第7期。

他是尊重望舒的,但在戴望舒逝世40年后还没有忘怀当年的调侃。不言而喻,这一切都给敏感而自尊的诗人带来创痛。这虽然只是他生命中的一个小小片断,但他的思虑却更为深广,并由此凝聚为一种内心生活,一种命运。尽管他有时开朗,但内心却阴云郁结,更多的时候则是难得一笑。他性情冲动,总使人感到有一股很强的内驱力,一种求得心理平衡的骤然爆发力,这是他心灵无法承受一再挫伤的自卫性的发泄。成年后,他曾经问过母亲,“为什么小时候没有把我的天花治好?”^①母子感情终生都很平淡,望舒既不是孝子,也不是逆子。^②阿·阿德勒在分析儿童对待缺陷的态度时指出:“他的缺陷引导他去加倍精心的训练。这对于培养一个人的艺术天赋和才能常常有极大的好处。处于这种位置的小孩总是在进行着雄心勃勃的战斗去克服他的局限性。”^③望舒也是如此。可以说几乎从启蒙之初,他便逐渐地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就要在某一方面成为强者。他孜孜不倦地执著地追求事业上的成就,反复吟唱着那发自内心忧郁的诗歌,与此也是不无关系。

戴望舒是独子,但并不被父母所宠。母亲较严厉,常说:孝顺,孝顺,最要紧的是“顺”。^④姐姐戴瑛略矮胖,活泼开朗,望舒自小就老实寡言,依从姐姐。刚到北戴河时,年龄较小,母亲又要做家务,不让姐弟二人出去玩,用一根长绳子的两端把二人的手绑起来,扣在箱环上。姐姐叫弟弟向箱环前靠拢,她的绳子就可延长到门外,她便可以到门外去玩。望舒就按她的话去做。这件事在90年后的今天,仍在戴望舒后辈中流传,很突出地显现了望舒童年的性格、清苦的家境和不温不冷有点压抑的人伦关系。

寂寞中成长的孩子,又往往敏感,重情意。望舒在18岁时曾写

① 据施蛰存先生1994年6月9日所谈。

② 据穆丽娟女士1994年6月11日所谈。

③ 阿·阿德勒:《生活的科学》(苏克、周晓琪译),三联书店1987年,第33页。

④ 钟冀:《我的回忆》(手稿)。把“孝”、“顺”分开使用,可能是杭州人的一种习惯,郁达夫的小说《迟桂花》中翁则生在给郁君的信里说:“……所以落得由她(指母亲——笔者)摆布,积极地虽尽不得孝,便消极地尽了我的顺。”(《郁达夫小说集》(下),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16页。)



了一篇散文《回忆》，追忆了他童年时在北戴河发生的一件事：他和自幼青梅竹马的曼云妹妹在海滩上玩耍，曼云妹妹为捡贝壳，被海浪卷走了。他说，当时我“晕”了过去，其后“我终日在海滨盘桓着，有时二三轻鸥从我头上飞过。我总也痴也似的唤着曼云妹妹，因为伊或者已化为鸥了，但是我想化作鸥呢？除非是在梦寐中罢。”^①这段不幸遭际的感情蕴涵，虽是他18岁时的再度体验，但至少在当时，在戴望舒幼小的心灵上却留下了深深的创痛。他最早以“戴梦鸥”、“梦鸥生”为笔名，就是表达他对曼云妹妹的缅怀，郁结着一份淡淡感伤的情愫。

戴望舒八岁入杭州嵯武小学读书。学校在他家西南方向的珠宝巷内，他要穿过好几条长巷去上学。小学校长是位推崇国粹的学者，又是一位书法家，要求严格，学校办得很有名气。择师教子，所以尽管离家远一点，父亲还是让他进了这所小学。望舒在这里不仅要读古诗文，还要临龙门帖，练太极拳。E. 希尔斯指出：“延续传统第一个也是最实在的例子体现在教师和学生的关系之中。”^②戴望舒由此发端，在教师的反复传道、授业、解惑的过程中学习和领会丰厚的中国文化传统。他以后在创作和治学上的严谨作风，也是从这里开始得到训练。在小学期间，他还很爱看《水晶鞋》、《木马兵》等外国童话书籍。对于这些奇幻瑰丽、趣味丰富、能够使思想活泼起来的童话，他最为称心，甚至一二十年后，他还没有忘怀孩提时的这段快乐。他先后翻译了《鹅妈妈的故事》（[法]贝洛尔）、《青色鸟》（[法]陀尔诺伊）和《美人和野兽》（[法]陀尔诺伊）等童话故事，馈赠给新一代的儿童，正是来自他这不泯的童心。中和西，严格凝重和活泼新颖，两种文化潮流从日常细微处，浸润着望舒幼小的心灵。

望舒一天天成长，如同许多同龄儿童的心理和性格发展一样，自我从游戏或象征性游戏幻境中走出来，逐渐现实化。他后来回忆说：鄙人在小孩子的时候常常听到乡下人谈鬼——

① 参阅戴望舒《回忆》，《兰友》旬刊第8—10期，1923年3月21日—4月11日。

② E. 希尔斯：《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页。

因为恐怖的印象在小脑筋上极为深刻，常常恐怕碰到了鬼，一到吃过晚饭，便不待妈妈的督促，很早就洗干净手脚，钻进被窝去，不管怎样好玩的玩意，也没有去玩的兴趣，诚恐白日沉西之后，房子里点起那盏半明半灭的油灯，便四方八面都阴森森像是憧憧鬼影，更恐怕从远处滚来一朵忽散忽合，忽大忽小的鬼火，或者听见由远而近尖锐哀惨的鬼叫，故而最好的办法就是钻进被窝去，并且盖过了脑袋，使眼睛瞧不见什么，耳朵听不到什么，这样才在妈妈的怀抱里又度过一夜。^①

直到年纪长大一些，胆子也大了一些，才逐渐解除这种幻境的恐怖。

“春夏秋冬天天过，寒来暑往又一年。”这是望舒母亲唱的“南音”（南方民歌）里的一句唱词。望舒后来说，这样的句子，使他逐渐意识到春夏秋冬代序，^②感觉到四季和人生的节奏。这是对客观事物或现象的延续性和顺序性的知觉，也是自我社会化的含量不断增长的标志。透过这些个人生活资料，可以看到，戴望舒成长起来了。

① 戴望舒：《两公婆见鬼》（1944年3月），《戴望舒全集》（散文卷），第447页。

② 参阅戴望舒《冬前腊鸭》（1943年6月），《戴望舒全集》（散文卷），第424页。



2 宗文四年

1919年,戴望舒从嵯武小学毕业,考入宗文中学。当时杭州的中等学校,包括师范学校、普通中学、女子中学、公立和私立的、中国人自己办的和外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大大小小的有八九所,学生总数达二千人左右。私立中学专收男生。宗文中学是一所私立中学,在校学生有二百多人。一进校门,迎面有一座假山,假山上有一所图书阅览室。校门西侧带有走廊的平房是教室,教室环抱之间有一小操场。学校规模不大,但办得很有名气,比戴望舒低一年级的张天翼后来在回忆中称之为“省会第一流的学校”^①。戴望舒在这里度过了四年。



中学读书期间

中学一二年级时,望舒还没有脱尽童年时的依附性,他习惯依从姐姐,姐姐和表兄谈恋爱,他也常常吵着要跟去。有一次,因为固执地吵着要跟姐姐一块出去,还被母亲用棉被

把他头蒙起来打,打得小肠岔气。传统守旧的家庭对他仍有一种压抑感。穿背心打篮球,被认为有伤大雅,别人看到了,告诉他父母,也能招致一顿打骂。直到三四年级时,他才在人与人的社会交往中,逐渐丰富了情操,确立了个性,并在文学上对自我价值的持久的追求中显现出风华。

当时的杭州是新文化运动风暴的一个漩涡,新与旧、进步与反动的斗争激烈。在这场斗争中,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师生坚定地站在

^① 张天翼:《我的幼年生活》,《文学杂志》第1卷第2期,1933年5月。

前沿。校长经亨颐崇尚“人格教育”，重视学生个性的发展，提倡“自动、自由、自治、自律”。他支持学生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倡导新文化，聘请被称为提倡新文化“四大金刚”的陈望道、夏丏尊、刘大白和李次九担任语文教员。这些都引起社会上守旧势力的嫉恨。后来，学生施存统在《浙江新潮》第2期上发表题为《非孝》的文章，引起轩然大波。浙江教育当局以此作为经亨颐的“罪证”，企图解除他的校长职务，一师学生发起“挽经复职”的运动，酿成震动全国的“浙江一师风潮”。这次风潮，由于进步师生的坚决斗争，一直延续到1920年春才胜利结束。经亨颐 and “四大金刚”后来虽然离开学校，但一批很有影响的新文学作者如朱自清、俞平伯、刘延陵和叶绍钧，又相继到校任教。在他们的引导和支持下，“晨光”文学社（1921年10月）和“湖畔”诗社（1922年3月）等社团先后成立，推动着浙江新文学运动的发展。

戴望舒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文学活动的，不过他不经意中走的是另一条路线。如果说，“晨光”、“湖畔”诸社友是在新文学新风气下开始的，那么，戴望舒则是在旧传统蝉蜕中起步的。

和浙江一师相反，宗文中学则是被旧派人物把持的一个据点。校长是一个研究杭州地方志的学者，他起劲地反对新文学，甚至不准学生看小说，认为“无论什么小说总是有害的”。他连外文字母都没有学过，却教外国历史和外国地理。有一次他做一篇白话文，请国文老师替他标点，油印发给全校学生，当国文课教材，还说“我这篇文章是反对白话文的，但是我故意要用白话文写，这是以彼之矛攻彼之盾，而且也叫人晓得我并不是不会做白话文。”^①顽固且又可笑。尽管段祺瑞政府教育部在1920年3月要求各小学一律废除文言教科书，并扩大到中等学校^②，但宗文中学采用的教科书还仍然是文言文，不管哪门功课，先生都像讲古文似的，都先要把字面解说一遍。学校空气较沉闷。年轻的戴望舒还不能根据自己的志愿和理想来选择学

① 张天翼：《我的幼年生活》。

② 参阅（美）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3页。